

毛泽东:开会发言不能看眼色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

从1955年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搞了两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毛泽东也想听听地方干部的意见。这天下午3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坐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

面向毛泽东。地委书记坐第一排,省委领导坐第二排。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是讲的都是一个调子,只讲农业合

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再开。”

随后,他在纸上写下八个字:“真可惜,时间浪费了!”并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党的一大,会上就有争论。开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讲到这里,他转身对工作人员李银桥说:“今日开的是重复发言的会,耽误时间的会。你

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

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高兴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朱远航

党史上的今天

全国第一次妇代会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任副主席。1957年9月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周旋

1947年3月25日至5月初,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周旋打转,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敌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的战局。

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1月14日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据中国共产党网

领袖家风

邓小平借钱买文具



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他人的要求。

邓小平既是一位伟人,同时,也是一位凡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普通人的平常心。他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儿子。在晚年,他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样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享受子孙同饮的天伦之乐。他喜欢孩子,但不惯纵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做事的本领。1992年2月18日,邓小平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文具柜台,借钱买了四包铅笔和四块橡皮,送给孙子们。他对孩子们说,铅笔是让你们好好学习的,橡皮是让你们明白,错了就要改。他还对孙辈们说:“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据《学习时报》

聂荣臻在香港三次虎口脱险

“父亲在香港曾经数次历险。”女儿聂力在其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聂荣臻三次遇险的情形。

第一次是结婚前,聂荣臻外出和恽代英、叶剑英碰头,回自己的住处,刚到门口,就看到他雇请的阿姨,正把他的行李往楼下搬。聂荣臻感到十分奇怪:她为什么搬我的行李?但警惕性驱使他没吭声。那位阿姨倒是个好心人,机警地给他递了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了事,从容地离开了。

事后得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敌人搜查时见到一张写有聂荣臻住址的小纸条,便立即扑过来了。那是广州起义失败不久,聂荣臻刚到香港,为了便于联系,就把自己住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省委秘书长沈宝同。恰巧那会儿聂荣臻不在,躲过一劫。

第二次,青年团在一个秘密地点开会,聂荣臻也要参加。他去的途中,因事耽搁了一小会儿,等他赶去时,看到一群面熟的人正往楼下走。他们都是来开会的呀,怎么往下走?聂荣臻立即意识到,他们被敌人控制了。他镇静了一下,表情轻松大摇大摆地继续往楼上走,和敌人擦肩而过,敌人反倒没怀疑他。

第三次,聂荣臻遇到了叛徒。那时香港只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外出经常坐电车,很容易碰到特务或叛徒。那天聂荣臻上了电车,突然看到有个人眼神不对,聂荣臻知道遇上叛徒了。这个叛徒也认出了聂荣臻,还冲他点点头。聂荣臻知道不妙,如果他上前动手就麻烦了,瞅准时机,挤到门口,抬腿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那时候香港电车的车门是不关的,做秘密工作的人,重要的一条是要学会跳车。”

地下斗争中,聂荣臻还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路来“咔咔”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他外出执行任务,尤其是在夜里,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及时避开。“父亲总结道,马虎大意的人,不适合白区工作。有不少好同志,就是因为粗心大意,白白牺牲了自己。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据《福州晚报》

李立三犯“我就是犯了错误的李立三”

的严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他不止一次深刻检查过,并在实际行动中努力认真改正。

1945年11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活动中,会议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邛同志作报告。”只见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接过话筒就讲开了,他讲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经验,又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当讲到李立三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李隆邛还提高了嗓门,说完这段历史,李隆邛突然大声问听众:“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回答:“不认识。”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全场一阵震动,被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感动。

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李立三



也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9年春,他的儿子从蒋管区来到他身边,他一见面就问孩子:“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讲了自己的错误后又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自己的

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

1956年9

月,党的八大前夕,他起草了一份在这个大会上的发言稿,准备进一步反省自己的错误。在这个草稿中,他特别提及党的“七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事,不仅“完全出乎预料”,而且“给了他莫大的振奋”。他从自身经历深刻感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一整套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的伟大和正确,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此,更加强了他改正错误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看了他的这个发言稿,欣然批示:“好”。李立三在大会发言后受到广泛好评,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据《北京日报》

苏-27谈判:他一人喝倒17个将军

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他作为苏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飞机的谈判。彼时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那是他们的老把戏,在酒桌上击败对方是取得绝对心理优势的第一步。宴会上,中方代表团中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

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起先,苏联人以为是中国入舍不得上茅台酒,所以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他们。可是没想到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头饮水的驴。”

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和在一个大水晶杯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要知道俄国人是贪杯的民族,但是最怕的就是将伏特加和啤酒混合起来的“约尔什”。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就这样,“乌斯季诺夫法则”被反过来用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苏联那

些被灌怕了的将军们呢?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

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成套的水晶工艺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SONY摄像机和一些他们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台二手的SONY摄像机在莫斯科基辅市场能卖到怎样的价钱,大家伙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战中以一个他们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签订了合同。

据《老年文汇报》

中央多次重修陈独秀墓

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但这次所用蚕豆花中,有部分已经发了霉,因此中毒。第二天有朋友来访,午餐食用四季豆烧肉过量,夜不成寐,至午夜呕吐,吐后稍缓。至17日,头晕目眩、多次昏厥。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终年64岁。6月1日,陈独秀被安葬在县城大西门的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墓地及安葬均由江津名绅邓塘秋叔侄赞助,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

1947年5月,遵陈独秀遗嘱,其子陈松年将他的灵柩起运至家乡安庆市城北后营,于同年6月1日下葬,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

碑文“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怕引起麻烦,立了碑后,只在上刻上陈独秀的科考名字“陈乾生”。

1979年10月7日,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安徽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批示,陈独秀墓可以家属的名义修一修,立块碑。1980年由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简单地进行了修葺,请几位农民挑些土将坟抬高一些。在原碑不存的情况下重立了碑。此前,墓地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已成平地,在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叫朱雅盛的老农帮助下,大家才确认了墓地。老农说,原来有块石碑,1958年被人挖去铺路了。

1981年5月,陈独秀的后代给

邓小平写了封信,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墓地之事。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2万元进行了修葺。

后来,陈独秀的墓园得到重修和扩建,墓台占地185平方米,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经过努力,1999年底国家文物局及安庆市政府共计拨款130万元,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葺。由占地200平方米,扩大至1058平方米的二层墓台的墓地。2005年至2007年,在安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关注下,倡导市、县各级部门及党员捐助一千余万元,扩建了目前较为有规模的墓园,并竖立了陈独秀的铜像。据《深圳特区报》